

经典

域外传真

莫马迪的诗性文学:《远古的孩子》

□张 琼

N.司各特·莫马迪(Navarre Scott Momaday,1934-)是美国本土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小说和诗歌创作上卓有成就和声誉,他的长篇小说《晨曦屋》(House Made of Dawn,1968)被认为是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第一部小说,作家因此获得1969年普利策奖,成为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重要人物,为美国本土文学开创了新的局面和突破口。

莫马迪的父亲是印第安基奥瓦族画家,母亲有着部分切诺基族血统,一家人在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州长期生活,曾经居住在纳瓦霍、阿帕契、普埃布洛族的保留地。自小,莫马迪就成长在各种印第安部落中,耳濡目染了印第安人的故事和话语的诊疗作用,并运用于后来的文学创作,为美国文学开创了新的叙述技巧。无论是他的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自成独特奇幻的象征体系。在这一象征世界里,人们的文化记忆被激活,人类与自然的特有关系得到深化。莫马迪始终坚信自己的使命就是帮助印第安人保存完整的美国本土文化身份。他希望印第安后裔能珍视并懂得欣赏自己的族裔文化身份。同时,他也见证了本土族裔对于身份观念的变化,意识到族裔文化和记忆保存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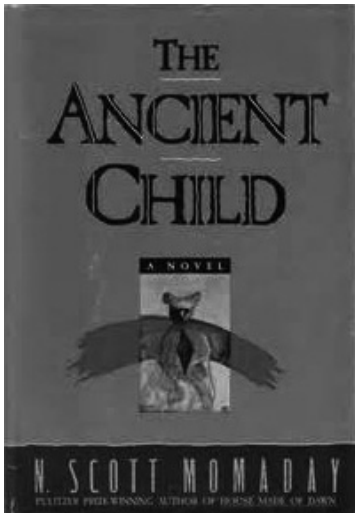
然而,那些希望从莫马迪的创作中尝试找到“纯粹的”印第安文学特点的人们或许会发现,莫马迪其实是个高超的兼容并蓄的创作者和杂糅家。他为美国文学带来的启示在于: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印第安人各个部落间的交流和文学的多族裔特征就已存在,这为当下美国文学的多种族、多元文化特征开创了很好的典范。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本土文化就是美国多元文化的缩影,它始终在不断交融、变化、多元中丰富着自身。

在《晨曦屋》中,主人公深受越战的战争创伤,挣扎于本土族裔和现代美国两个世界中,觉得矛盾错位。20年后的1989年,莫马迪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远古的孩子》(The Ancient Child)问世,依然聚焦于一个挣扎于两个世界的人,然而作品中的精神诊疗意义更为突出,作家的视野更为开阔和完整。此外,《远古的孩子》就像《晨曦屋》和莫马迪其他的诗歌、散文创作一样,呈现出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其内心的指向永远是那个远古的、心灵的家园。通过阅读小说,人们甚至会像主人公赛特一样,体验着某种精神诊疗,从喧嚣的困惑中,逐步退入心灵的内境,寻找那个宁静的、和谐的归属。诚然,莫马迪曾坦言:“我的写作是一个整体。我已经写了九部作品,可是对我而言,它们都是同一个故事的组成部分……我的目的就是传达那久远已始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开始没有尽头。”莫马迪并非在重复自我,也并非省力偷懒,他作品中的重复、延续和回应等,都是有意为之,因为作家希望将这种本土族裔的故事和风格在往复、变奏中得到延续,他甚至可以同一类主题在每一种体裁中重述和推进。这种创作表达,类似于本土族裔在传统吟唱和故事叙述中的特征,即每一次重复都有新的意义和变化,在重复中渐次发展,给人们带来一种连贯和延续性。这种方式,也是印第安后裔在现代生活中不断与传统和文化继承发生关联的途径,是他们感受到归属感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

在《远古的孩子》中,从小失去父母,被养父母在城市抚养长大的艺术家赛特在绘画创作上独具天赋,成了旧金山的知名



N.司各特·莫马迪



《远古的孩子》

画家。某日,人到中年的赛特接到了一封电报,告知俄克拉荷马州家乡的老祖母即将去世,临终前希望见他。于是,好奇和迷惑的他踏上了那片陌生的故土,并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得到了一个神秘的药包,并结识了那里的印第安乡亲,尤其是格蕾。此后,回到城市的赛特心情难以平静,精神困惑不已,身心俱疲,大病一场。他被朋友送回了故乡,由此开始了心灵和身体复苏的过程。同样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着困惑的格蕾带着赛特去了自己母亲的家,让自己和赛特一路驰骋在自然中,体验着与从前迥异的生活。最终,两人成婚,赛特的情感和身份困惑也得以消解。可是,作家笔下的尾声是神话超然的,赛特就像部落传奇中所说的,最终走向自然,走向幽深的秘地。他回望着宁静的家园,身体沉重,声音不再是人类所发出的,渐渐地消融在了重重阴影中,如神话中所言,他幻化和变成了那只神性的熊。

理智的读者在面对这样的结局时,即使再深陷于故事,也会明白结尾处的象征意义,它超越了真实和现实,与其说是作家的安排,毋宁说是在作家的想象之下,文字叙述的走向使然。那个回归家园的自我,与那只神秘如幻影的熊,就是我们内心一层层自我,终于合一、和融、和谐,慢慢挣脱掉无谓的附加、重重的外壳、俗世的枷锁,进入了那个心灵的自由王国。“他继续向前,隐身进入一重重的阴影之中。”“重重阴影”正是作家给全书的结尾,仿佛徘徊不去的乐音,萦绕在我们周围。

在这里,那句几乎成为陈词滥调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其中十分贴切,只是,我们最终会忘掉那些关于族裔、部落等具体特色,因为小说的指向是普遍的,作家的族裔超越也是显然的,他笔下那个挣脱束缚的痛苦过程,起伏心声,以及那个最终留给人们的影子,似乎就是一种启示和召唤:你究竟是怎样的生命,你为何在茫茫人世中遇到所有这一切,为何内心会时时闪现地有着这些呼唤和渴望?

我并没有将小说当作族裔历史或传统风俗来猎奇,更没有被那些不断呈现出碎片化的叙述片段,尤其是关于族裔历史上那些绿林好汉们的故事变奏,弄得因顿不解。在故事的主线下,

这些传说甚至很多都是格蕾基于历史传说的幻想,就像是推动主线不断发展向前的暗流,引导着赛特走出迷雾,进入他曾经忘却的家园。

那个远古,或许并非只是时间维度上的久远,也是人类生命原初的冲动和热情,是不被文明困住天然本性的原点,是那个准备出发的起点。书中,赛特生活在城市和自然间转换,他的情感和肉体冲动也在不断变化,他困兽般的境地并非印第安裔美国人专属,同样,他的解脱也能与无数人共享。读者可以从“远古”的象征中获得不同的领悟。我们以为割裂分离的生命,归根结底有着某种可以溯源的原点,而从那个地方,重启生命的热情和意义,那也是作家在写作中的努力目标吧。

莫马迪是个有趣的作家,他把诗歌的叙述放在自己的绘画中,将小说写成了一篇超长的诗歌,而他自己也最愿意归属到诗人行列。他的叙述宛若长诗,而篇章中也确实充满了开启式的诗,或者说是吟唱,往往读到故事的间歇处,诗意的吟唱在耳畔响起,那是我们心灵在倾听和共鸣,唱得荡气回肠,仿佛鬼魅般延宕着那独特文化的意蕴。

然而,莫马迪展现的世界并非是一味怀旧和乡愁感深重的,他并不是独独关注具象的遗产或工艺。在他的象征中,激发回忆的精神比失落感更加重要,人的想象力和与自然的亲密,比对往昔的怅惘更具有感染力。深谙嘈杂都市的人们,会被莫马迪笔下美国西南部的风景莫名打动。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究竟是何种特质让他如此关注那里的生活和风景时,莫马迪回答:“我觉得那里的风景比任何地方都更具有精神特质。”更重要的是,那里的印第安族裔和土地有着真正的亲密联系,他们对大地心怀依恋和归属。于是,归属感成了莫马迪笔下不断重复的主题,它消弭了疏离和异化,让人融入生存的世界,而不是人与世界的二元对立,因为印第安人的整体世界观,就是宇宙的基本和谐。

然而,若说这样的创作是“归家”指向,也确实有一些关于印第安裔作家作品的评论有关究竟能否回家、归家之后的目的何在等询问,但是,对于个体的读者而言,不问企图,不问文化语境,单纯被作家绮丽洒脱的想象吸引,带着遐想随着陌生而熟悉的文字从生活中暂时脱轨,这种感觉何其珍贵。

莫马迪多次强调语言和词汇的神奇力量,因此,他在文字所构筑的作品中,也揭示着超乎人们认知的语言魅力和影响力。他认为文字自空中中来,却铸造了意义,因此他就用文字来激发想象,用声音来激活生命。所以,阅读莫马迪的作品时,也应该尤为关注他所强调的象征中的智慧和信念。

阅读中,我甚至忘了《远古的孩子》是一部展现印第安文化传统和神话体系的小说。那些远古的神话,熊的图腾和神性以及女主人格蕾的药师身份,都是对读者焦虑的抚慰,是一种与凡常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和精神体验。例如,格蕾就常常挣脱“文明”和理性的束缚,在幻想中一遍遍重温着部落传奇、神话、历史事件,想象着桀骜不驯的男人们如何厮杀、被杀,如何骑马飞奔,如何征服女人,甚至体验和小魔王比利做爱,会嫉妒曾经拥有过他的女人。这样的个人想象,基于历史和传说,一次次在格蕾心中变奏,在小说中显得十分生动。

在美国文学中,文学的呈现多样复杂,各种题材层出不穷,而如此诗性的小说,恐怕是血液里有着本土族裔基因的作家们最得心应手,也最难难以匹敌的。我更愿意将他们的创作称为诗性文学。这种诗性,兼顾着现实关注,表层看是作家不断思考并揭示身为美国印第安人的意义,其针对的是更广义上的美国人、地球人的生存。在莫马迪所构建的生活中,我们既体会历史,又着眼当下和未来。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族裔是起点,在不断推进和变化中,它成了每一个人的文化财富和思想资源。

俄罗斯2014“最佳图书奖”揭晓

日前,2014年俄罗斯“最佳图书奖”在莫斯科颁奖,8位作家分获不同奖项。其中,雕塑家弗拉季米尔·图鲁洛夫因《手持书本的步行者》获年度散文奖;扎哈尔·普里列平因《居住处》获年度长篇小说奖,入围该奖项的长篇小说有: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货的时间》、克谢尼娅·布克莎的《“自由”工厂》、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的《会思维的狼》。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馆长安德列·索罗金以三卷本《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获奖。

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最佳图书奖”于1999年由俄罗斯联邦出版总署设立。该奖旨在支持俄罗斯图书出版业、鼓励最佳图书和印刷业、推广阅读和图书文化、提高图书在社会意识中的作用。沃兹涅先斯基、布雷乔夫、阿赫玛杜琳娜、叶甫申科、乌利茨卡娅、格里什科维茨等作家都曾获得过该奖。

阿列克谢耶维奇 获颁法国骑士勋章

10月21日,法国驻白俄罗斯大使向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颁发法国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

多梅尼克·加佐伊大使称,阿列克谢耶维奇并非按照正式的历史文献来描述历史,而是从个人经历、机密档案以及从被忘却被否定的资料中挖掘,在此基础上写出作品。她的创作意义更加深远,远远超出技术性文献的意义。阿列克谢耶维奇关注的焦点永远是人,探索人的心灵是她与其他作家的区别之一。她成功地表现了一代人的茫然和恐慌,作品触动人的内心深处。

在颁奖仪式上,俄罗斯“时代”出版社总经理鲍里斯·帕斯杰尔纳克向多梅尼克·加佐伊大使赠送了两套该出版社出版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全集5卷本。加佐伊大使将把其中的一套转交法国总统奥朗德。“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全集5卷本包括:《战争中女性》《最后的见证人》《切尔诺贝利的祈祷》《铍娃娃娃》《二手货的时间》。

白俄罗斯总统批评作家创作

日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批评白俄罗斯作家创作不出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样的佳作。

卢卡申科说:“最近二三十年没有产生‘当代的《战争与和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原因何在?是因为没有天才,还是由书籍已不再是信息主要来源这种客观条件所造成的?”

卢卡申科说,“今天谁都不会擅意作家该写什么、怎么写”,但“自由没有产生伟大的文学,却导致作家团体的分裂”。“怎么办?是陷入绝境,还是我们仍有恢复统一创作领域的希望?”卢卡申科表示,他不相信白俄罗斯文学已经进入萧条时代。“在白俄罗斯人民生活中,文学始终是认识世界、教育人民的手段。值得指出的是:库帕拉和科拉斯、波格丹诺维奇和梅利日、科罗特克维奇和贝科夫的诗歌与小说,是世世代代白俄罗斯人民骄傲的源泉。”

(杨 庄 编译)

天涯异草

与海地姑娘论波德莱尔

□沈大力

别了,我们转瞬即逝的,夏日灿烂的曙光!我已听见萧萧落木在庭院的砌石上簌簌作响,像在唱挽歌一样……

秋天来临了!这神秘的天籁仿佛在一人送葬……

——《秋之歌》

这是《恶之花》中的一首悲秋诗,作为该集《忧郁与理想》部分的名篇为人传诵。不知为什么,我邻舍的一位海地女子特别迷上了此诗。她芳名唤作曼菊,两年前被从遥远的安德列斯群岛专门招来,在蒙巴纳斯大街的“克里奥尔美人”酒馆当招待。她听说过我研究法国诗歌,几次登门清谈,和我切磋诗艺。

“《秋之歌》以时空为序,辞句佳,音调凄切,给人以莫名的哀伤,领略一种忧郁美。”曼菊说,“整篇诗似雾如烟,细微窈窕,难以知论,不可辩说。”

“我想,诗以天籁为上。波氏幻笔,让人似懂非懂,也许正是该诗的魅力。”我笑答,“照中国的诗画传统,形本无形,惟无形者无可奈,非虚非实,不可解而可解,才是高妙意境。若一味执拗于人之邪正、贞淫、美恶,诠释得太实了,反而走义。当然,可以理语成诗,但应寓理成趣。理趣高于理语,方有余韵。”

“据说波德莱尔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他的情人玛丽·多勃伦。”曼菊追溯诗源说,“落红香径,诗人想借爱情来缓和自己的厌世心绪,即他在整部《恶之花》中流露的巴黎忧郁。”

“巴黎的忧郁乃是对时光流逝、人渐衰老的焦虑。”我直抒己见,“与维克多·雨果《世纪的传说》那种采用大调的史诗风格相比较,《秋之歌》是天籁绝唱,小调哀鸣,其特点在于诗人的心态与秋天、秋色和秋景之间抽象的、微妙的应和,从而使秋天变成诗人的心理季节,给读者以神秘的哀伤,一种不匀称、不调和、不完善的美感。”

赞同道,“这诗里溢出的时序更迭,秋天终于来了的失落感,对冬之将至、死到临头的内心恐惧,故有听落木萧萧似挽歌的痛觉。另一方面,秋天又是一年中最温和的季节,颇似女性爱的柔情,含着甜美。因可以说,人对死亡的怀疑,或许会变成对彼岸的展望。”

听其言,我猛觉得艺术并非曲高,和弥寡。眼前的少女就心有灵犀,对《秋之歌》似有敏锐的感应。她从中悟出的生死观确有辩证意味。

“《恶之花》出版于1857年,正值浪漫梦破,世纪病重之时,故它倾泄出一代年轻人幻灭的忧郁感,就是所谓的‘世纪病’。在这方面,您觉得波德莱尔有何特殊之处吗?”曼菊问我,似乎想了解崇尚心态和谐的东方人对西方矛盾情绪的看法。我琢磨片刻,回答道:“与中国天人合一的哲理相反,法国一代代文学家用作品反映人与其生活境遇的冲突。18世纪时,法国诗人克雷彼说:‘高乃依占天,拉辛掬地,给我剩下的只有地狱了。’100年后,波德莱尔出世时,已没有外界地狱了。他惟有只身索隐,在自己痛苦的内心世界浇灌病态花朵,以奇取胜,显得出类拔萃。从恶中萃取美,以恶与美的对照,通过反差强烈的意象,揭示人灵魂深处的奥秘。”

我又引申说:“波德莱尔颇似我国古典诗坛上李贺和李商隐一类的诗人。在他眼里,‘花’除呈现诱人的华采外,还给人以文苑探幽的启迪,而‘恶’不仅意味着罪恶,而且明喻着痛苦,二者于辩证的哲学中共存,又在人囊幻现双重投影。一面是从苦难的田野采集的花朵,另一面则可归结为对罪恶的逢迎。因为,恶之沃土,乃是美之温床,而恶之花却能散发出春之芳香。这也许正是您喜欢《秋之歌》的缘故吧?”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读诗的乐趣在于探幽寻僻扶微,这是布瓦洛的《诗艺》所难以企及的。泰勒和勒南的实证评论拘于历史体态和时空影响,而圣佩韦虽重视了个人心理因素,但也过分突出史地环境,没有摆脱‘精神家族’的窠臼,仍有教条评论的痕迹。故而,马塞儿·普鲁斯特发表《反圣佩韦论》,适应了时代变化的思维运动。尤其是弗洛伊德揭示的潜意识,偏重于想象和梦境的内向批评,使人得以含英咀华,穿透现实的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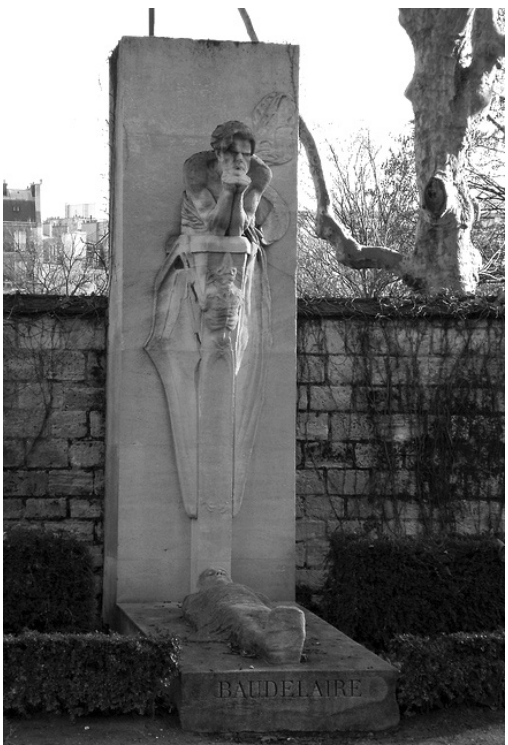
镜,去意会波德莱尔诗中超语言、超自然的神秘现象。”

“说到神秘,我国古代有一种禅诗,玄言奥义,表达参禅悟境,以清流沃心。此种佛教理趣诗类似印度佛经中的偈语,却不涉理路,全无寓理之迹。读者寻意句中,得趣句外,盖因其诗有可见的‘明相’和不可见的‘隐相’。后一隐相即禅之意境,二者关系似与乔姆斯基现代语言学中所谓‘表层结构’相仿佛。如一位叫觉海的和尚发问:‘岩上桃花开,花自何处来?’觉海和尚悟到岩上桃花不过是禅的表象而已,一如古希腊神话里幻化为水仙花的美少年那喀索斯溺死前看到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

“按一些美国学者的‘平行研究’原则进行对照,我看波德莱尔的‘超自然主义’很像中国文僧超然物外的禅机,其诗因玄想而特有奇趣。所谓‘恶之花’,乃是反映世界上一种反常而合道的现象。至于‘恶之花’,它无形有形,犹灯之闪烁,火之有焰。是一种超越,一种升腾,故而玄奥。”

曼菊回应道:“是这样的。波德莱尔受爱伦·坡影响颇深。比较来看,东西方佛教与其基督教的文神秘色彩是异向同质的,均在寻求超脱。刚才您谈到西方人与其生活境遇的冲突,我看《恶之花》正是显示了被这一冲突撕扯的人类灵魂,这一灵魂在功利主义社会里恒久感到的孤独和人为脱出这种孤独而对世间友爱的渴望……”

曼菊谈到她有一次去拜谒萨特墓时,偶然经



波德莱尔墓碑雕像

自由的篝火在燃烧。曼菊对这首诗体会更深,她接着吟诵道:突然有一天,我的茅屋显得空荡荡的,我失去了生活的阳光。我的妻妾将涂红的嘴唇压在钢眼征服者冷酷的薄唇上。我的儿女不再自然裸体,挨穿了铁血的军装。而你说,你也不再咚咚震响,我深夜里的塔姆-塔姆鼓,祖辈的塔姆-塔姆鼓!奴役的锁链撕裂了我的心房!“接踵而来的是‘三角贸易’,即贩卖黑奴。因为欧洲殖民者几乎灭绝了印第安人,突然发现新大陆没有劳动力了。”曼菊说,“殖民纪元的蓄奴一去不返了,可在我想,如今之世,‘失去一切的人’又复得了什么?您问我有什么看法,实在说不上来,只是异常失望,觉得沉闷迷茫,而这种感觉里还蕴含着模糊的希冀,恰似波德莱尔用‘恶之花’表达的病理心态……”